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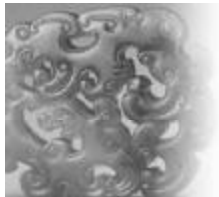
序：从昨天走向明天

中 国 语 文 教 材 发 展 史

昨天是今天的镜子，明天是今天的延续。

撰写《中国语文教材发展史》一书，其动因有三：一是因本人长期从事《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其中有语文教材方面的内容必须讲解，若无自己的研究成果，课堂讲解必然枯燥，且无说服力；二是因本人主持了重庆市教育规划课题《中国语文教科书发展史研究》，该课题的最终成果形式是撰写《中国语文教材发展史》一书；三是因本人具有一种历史责任感。在从昨天走向明天的历史进程中，已经产生和还将产生无数的语文教材，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一部《中国语文教材发展史》。虽然原西南师范大学吴洪成教授出版过一本《中国学校教材史》，华南师范大学的王建军教授撰写过一本《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山东省教研室林冶金先生目前正在准备编写一部《中国小学语文教育通史》，此外，还有张隆华先生的《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熊承涤先生的《中国古代学校教材研究》、李杏保先生的《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林冶金先生的《中国小学语文教学史》、陈黎明教授的《二十世纪中国语文教学》等，但这些著作仍然不是全面的语文教材通史。本人对中国语文教材的发展历史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与梳理，书中虽有诸多错漏

ZHONGGUO YUWEN JIAOCAI FAZHAN SHI



与不足,也可谓开中国语文教材发展通史研究之先河。

《中国语文教材发展史》探讨了在远古至今的历史岁月中,语文教材历史演变的基本过程、阶段特点,在清理纷繁复杂的语文教材的发展线索的前提下,加强了语文教材自身所涵盖的文化、教育、教学等问题的研究,既有宏观的历史审视,又有语文教材的个案剖析。书中融合了各时期的历史知识、学术思想和学校教育,突出地阐述了语文教材在学校教育中的重要地位,深入地分析了古代蒙学教材、近现代及当代语文教材的思想内容、选文标准及编撰特点。特别是对1902年语文独立设科以来语文教科书内容的时代性、编排的科学性、读者的普及性等作了深入分析,同时还重点分析了商务印书馆在近代语文教科书发展过程中的编写特征及卓越贡献;对新课程语文实验教科书的编写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在书中列举了中国古代、近现代、当代及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的书目,其目的在于透过这些书目可以清晰地显现出我国语文教材的演进历程,并且给语文教材研究者们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材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中国语文教材发展史》试图通过语文教育教学理论的阐释,以历史学的宏观或微观的视角,结合教育界、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并吸取哲学、文学、文化学的有关思想内容,对中国语文教材的发展历程进行综合性的探讨。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与最初的目标有很大的距离。几千年的语文教材发展史,两三年的时间是很难将其研究清楚的。对我国语文教材发展史的研究与探索,前辈及时贤已做了很多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留下很多空白地带,在今后的教学和科研中,我将投入一定的时间和精力,继续做深入的研究。

李良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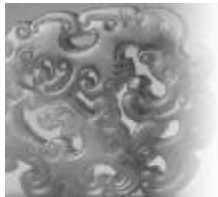
2005年10月于涪陵师范学院



一国之教育目的体现为一定的课程标准，一定的课程标准又体现为一定的教学内容——教材。从某种意义上讲，教材是一个国家的教育意志的重要表现。教材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它集中体现了国家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反映了国家意志，它“包含了社会认可的知识及蕴含于这些知识中的合法化的意识形态”。同时，教材是教育内容的载体，是教学的基本要素之一，它对教学内容具有规定性的作用。因此，教材的作用不是一般读物可比拟的。有人说：“一本薄薄的语文教科书，其实是非常沉重的，它是整个国家民族精神的象征，它是人类优秀文化的传承，它用母语丰富滋养着人的心灵，培育着每一个有个性的生命”^①。语文教材不仅是语文教育的主要凭借和学生获取系统语文知识的重要来源，而且是中国文化的载体，是中华民族对文化选择的具体体现^②。而语文教科书，它作为一个国家民族精神的象征，人类优秀文化的传承者，其地位和作用更不可小视。

①：韩艳梅：《特色 问题 建议——语文新课程实验教科书透视》，《全球教育展望》2003年第9期。

②：李良品：《论中国语文教科书的近代化》，《学术论坛》2005年第3期。



一、“语文”的界定

要研究中国语文教材发展的历史，首先必须确切地界定“语文”。历来人们对“语文”一词的认识和理解是不一致的。如《辞海》将“语文”解释为“语言文字”；《现代汉语词典》对“语文”的解释是：①语言和文字；②语言和文学。就是著名学者对“语文”的解释也不一致，如语文教育界的“三老”对“语文”的理解就有差异。叶圣陶先生在《认真学习语文》中说：“什么叫语文？平常说的话叫口头语言，写到纸面上叫书面语言。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而吕叔湘先生在《关于中学语文教学的种种问题》一文中指出：“‘语文’这个词本身的意思就不清楚。可以解释是语言和文字，也可以解释是语言和文学。”而张志公先生在《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一书中指出：“语文这门学问主要是语言文字之学。”自我国 1902 年单独设立“语文”学科以来，其名称曾几经变化：1902 年，清政府的《钦定学堂章程》中设立“词章”课；1904 年，清政府的《奏定学堂章程》中改“词章”为“中国文学”课；1912 年中华民国教育部改“中国文学”为“国文”课；1921 年教育部改小学“国文”为“国语”课，中学仍为“国文”课；1949 年，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开始使用“语文”这个学科名称。叶圣陶先生说：“‘语文’一名，始用于 1949 年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选用中小学课本之时……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便指，故合言之。亦见此学科‘听’‘说’‘读’‘写’宜并重，诵习课本，练习作文，故为读写之事，而苟忽于听说，不注意训练，则读写之成效亦将减损。”1949 年，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的初、高中语文教科书的编者在教科书的“编辑大意”中说：“说出来是语言，写出来是文章，文章依据语言，‘语’和‘文’是分不开的。语文教学应该包括听话、说话、阅读、写作四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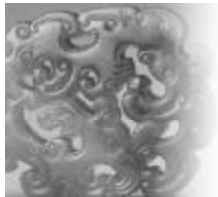
因此,这套课本不再用‘国文’或‘国语’的旧名称,改称‘语文课本’。”1949年以来,语文教育界对“语文”的理解和认识也不一致:有的认为“语文”就是语言文字;有的认为“语文”就是语言文学;有的认为“语文”就是语言文章;有的认为“语文”就是语言文化。综上所述,著者以为:

中国近现代语文教育发展史告诉我们,“语文”这个词语是在教育活动中产生的,在教育教学中用得最多,是一个教育名词。其名称的几经变化,说明了语文教育界对它有一个次第认识、逐渐理解的过程。

“语文”是我国中小学基础教育的一门学科名称。其实质是语言。可以说,“语文”是一个以语言为核心的包括语言、文字、文章、文学及文化在内的言语学科体系,是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统一体。所以,《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指出,语文课程应“指导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语文”。

从“语文”学科的能力培养来看,应该重点放在听话、说话、阅读、写作四项上。按不同的学段和年级,其侧重点又有区别:初中主要培养学生的识字写字能力、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和口语交际能力;高中主要培养学生的语文应用能力、审美能力和探究能力。

从语文学科的性质看,“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语文的主要性质就是工具性和人文性。语文的工具性表现在:①语文是表情达意的工具;②语文是思维和想象的工具;③语文是从事学习的基础工具;④语文是今后从事工作的基础工具。语文的人文性表现在:加强对学生进行人文精神的教育,即培养人文态度,陶冶人文素养。由此可见,语文的工具性强调了语文本身是工具,同时强调了语文课程的核心目的是培养人的工具理性;而语文的人



文性不仅强调了人不是一个工具,同时强调了语文课程对于实现人的价值和追求的意义,其核心意义在于人文主义精神。“语文课程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实质上是实现人的完整性”^①。

从语文教学的重点看,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名称的“语文”,既不等于“语言文字”“语言文章”,也不等于“语言文学”“语言文化”,它的内涵比它们都更加宽泛,更加丰富,只不过在不同学段、不同阶段各有侧重而已:在小学阶段,语文教学侧重于“语言文字”;在初中阶段,语文教学侧重于“语言文章”;在高中阶段,语文教学侧重于“语言文学”,但核心在于“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巢宗祺先生曾解释说:“《语文课程标准》所提的‘语文素养’包括:字词句篇的积累,语感,思维品质,语文学习方法和习惯,识字写字、阅读、写作和口语交际的能力,文化品位,审美情趣,知识视野,情感态度,思想观念等内容。”^②

本书的“语文”是指我国中小学基础教育的一门学科名称。这里的“中小学基础教育”,从学生的学龄来看,包括古代的蒙学教育阶段及近现代以来的小学教育阶段、中学教育阶段。

二、“语文教材”的涵义

“语文教材”这个名称,可以表达不同的涵义。目前,学术界认同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1)泛指语文教材。指一切有助于培养人们语文能力、提高人们的语文修养、对人们的语文学习产生影响的书面和非书面的、学校的和社会的语言材料。^③20世纪30年代,语文教育家夏丏尊说:

^① 王文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第38页。

^② 李良品:《对“语文”及“语文课程标准”的理解与认识》,《语文教学通讯·初中刊》2004年第11期。

^③ 王松文等主编:《语文教材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8页。



“国文科……只要是白纸上写有黑字的东西，当作字来阅读来玩味的时候，什么都是国文科的材料。”这种泛指的语言教材是“大语文教育”观支配下所认定的语文教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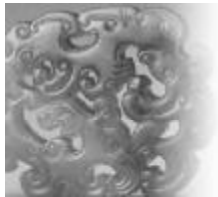
(2)特指语文教材。指根据语文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编写的，供学校开设的语文课上教师和学生使用的材料。国家教委1987年在《关于颁发〈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工作章程〉的通知》中说：“今后根据国家教委颁布的中小学教学大纲，编写可供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包括教科书、习题集、练习册、教学挂图、音像教材、教学软件、选修教材等，以及供教师用的教学指导书、教学参考书必须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或审查。”由此可见，语文学科的教材，除了教科书以外，还应包括专为学生编选的自学指导书和补充读物等。

(3)专指语文教材。指在上述的语文教材系统中占有特别重要地位的语文教科书。语文教科书即语文教材。朱绍禹先生认为，语文教科书是“基于一定的教育方针和学生的发展阶段，经过选择的、编排好的、适于教学的语文用书，是简化了的系统反映语文学科内容的教学用书”^①。

事实上，语文教科书是按照国家规定的课程设置、课程标准和不同级别学生的认识而编写的供语文学科教学之用的学生用书。语文教科书是中国文化的载体，是中华民族对文化选择的具体体现，是语文课程目标、课程内容的具体承载物，是语文教育教学的信息源。它是教师进行教学活动的主要依据，也是学生获取系统知识的重要来源。

本书大多用“语文教材”之名称是基于几种考虑：第一，为了尊

^①：朱绍禹：《中学语文教学法》，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8页。



重历史。由于“教科书”一词源于 19 世纪中叶外国传教士来华办学成立所谓“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的时候，因此从时间上不能指称这之前的语文教材。1902 年语文单独设科以前，蒙学阶段的语文教材一般称为“小儿书”“蒙学书”“蒙学读物”“蒙学教材”等；1902 年以后的语文教材称为“国语教科书”“国文教科书”“语文教科书”“语文课本”“语文教材”等。第二，为了尊重客观事实。如果将古今的语文教材均称“语文教科书”，这不符合客观事实。因为任何学科的“教科书”都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课程设置、课程标准和不同级别学生的认识”来编写（语文也不例外）。然而，1902 年以前，国家对蒙学教育既没有统一的学制规定，又没有一定的课程标准，儿童读物也没有按不同年级来编写，因此，蒙学读物不能称为教科书。由于古代的“蒙学书”称“蒙学教材”，近现代及 21 世纪《语文课程标准》颁布后的语文教材称“语文教科书”，所以，本书书名笼统称为《中国语文教材发展史》，但在书中很多章节仍将“语文教材”称为“语文教科书”。

三、中国语文教材源远流长、丰富多彩

我国语文学科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才 100 年，但是，语文教材的历史却源远流长。大体上经历了古代、近现代、当代的漫长的演变过程。说它“源远”，是因为它起源很早，从有史可考的《史籀篇》的编印，至今已有 2 500 年左右的历史；说它“流长”，是因为它从先秦以来，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延续至今，从未间断，并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中国的语文教材，无论是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是丰富多彩的。众所周知，在中小学的所有学科中，没有哪一科能像语文学科这样蕴含着丰富的知识营养——东西南北和古今中外一切科学的、艺术的、宗教的、历史的、伦理的、民俗的知识。在内容方面，文、史、哲、经、伦、天文、地理、科学、技术，字、词、句、篇、语、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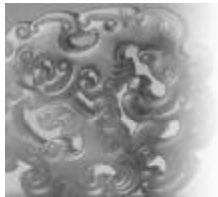


选、文等无不包含其中；在形式方面，单就古代语文教材来看，既有综合类、伦理道德类、历史知识类，又有诗歌类、名物常识类、工具书类；既有文言文教材，也有语体文教材；既有文选型教材，又有混编型教材。形式多样，不胜枚举^②。

（一）古代的语文教材是以蒙学教材和文选教材作为主体教材

先秦至汉魏六朝时期的蒙学教材以识字为主，同时进行品德教育，并包含各方面的知识。最早的蒙学教材是字书《史籀篇》，即“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秦代李斯作《苍颉》七章、赵高作《爰历》六章、胡毋敬作《博学》七章，“文字多取《史籀篇》”。至汉代，“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苍颉》中正字也”。其中《急就篇》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它大抵按姓名、衣服、饮食、器用等分类编成韵语，多数为七字句，以教学童识字为主。南北朝时期梁周兴嗣所撰《千字文》，是拓取王羲之遗书 1 000 个不同的字，编为四言韵语，共 250 句，叙述了有关自然、社会、历史、伦理、教育等方面的知识。由于通俗易懂，便于记诵，切于实用，故流传久远。隋唐至元朝的蒙学教材散失很多，现在能见到的为数很少。两宋时期的蒙学教材较之前代有许多新发展和新变化。即在前代以识字为主的基础上，伦理道德教育的内容大大加重。随着宋明理学思想的发展，传播性理学说的内容显著增加，如《三字经》就是把识字、传授知识与培养封建伦理道德规范结合起来，如“融四岁，能让梨”“首孝弟，次见闻”，“长幼序，友与朋”等。全书结构严谨、文字简练，通俗易学，而且比《千字文》更上口，适合儿童朗读背诵。在中国文化方面，形成了独特的“三字经文化现象”。明朝至民国初年有专门进行伦理道德教育的启蒙教材，如《小儿语》《闺训千字文》《名

^② 王玉辉：《语文教材嬗变论略》，《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98 年第 5 期，第 84—87 页。



贤集》《弟子规》等。清末“新政”时期，虽然新学制已诞生，新国文教科书也相继问世，但仍有扩充传统蒙学教材出现，如《三千字文》《万字文》《千家姓》等，也有改写的蒙学教材问世，如章太炎的《重订三字经》。古代的文选教材，当以南朝梁太子萧统编选的《昭明文选》为代表。从周到齐这一时期的优秀文学作品主要是依赖《文选》和徐陵的《玉台新咏》得以保存。《文选》所收录的，在数量和体制上较之《玉台新咏》更为广泛而齐备，1 000 多年来，一直行世不衰。《昭明文选》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是我国古代教材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由于《文选》开创了我国文选型语文教材的先河，一直为后世所仿效。直到现在，中学语文教材的体系，尽管编法很多，但从整体上看，仍未跳出“文选型”的格局。

（二）近现代语文教材是以语体文为主体、文白合编的单元组合，形式多样

现代意义上的中小学语文教材的形成，是在对旧式教材体系的不断突破和逐渐改造的过程中完成的。1904 年，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的《最新国文教科书》8 册，是我国实行新学制后供全国使用的第一部语文教材。1907 年由林纾编写、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学国文读本》，选文的编排采用由今溯古、由近及远的逆向编排方式，体现了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的教学原则。由此可见，清末的语文教材已有明确的语文教学意识，独立的语文教材体系已初具规模。“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语文教材体系的建立创造了条件。1920 年以后，有着 2 000 多年历史的文言文教材最终被白话文教材所取代。1924 年叶圣陶等编写的《初中国语教科书》360 篇，白话文就有 95 篇，占其中的 37%。后来晋察冀边区的《中等国文》课文，白话文已成为主体。而 20 世纪 30 年代叶圣陶、夏丏尊等编写的《国文百八课》编选了相当多的实用性白话文。上述教材一改旧式文选型教材文言



文一统天下的局面,而代之以白话、文言分编或混编的格局,标志着白话文占领了中国语文教材的阵地。特别是《国文百八课》每一“课”都编有“文话”“文选”“文法与修辞”“习问”等4项内容,它为语文教材单元组合形式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良好的范例。

(三)当代语文教材由“一纲一本”到“一纲多本”,并逐步朝“多纲多本”的方向发展

1950年至1986年,我国的教科书制度一直实行的是“国定制”(或称“统编制”),1986年10月国家教委召开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会议,结束了长期以来教材编审合一的局面。20世纪90年代,与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出版的《语文》教材并存的其他版本的《语文》教材,就有10多种在全国不同地区使用。自2001年和2003年的《九年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试验稿)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试验稿)颁布后,各种版本的中小学语文教材更是不断涌现,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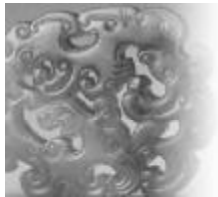
四、中国语文教材在不断发展、逐渐完善

我国自西周开始到现在的中小学语文教材,其内容和形式都是在不断地发展和逐渐地完善。

西周至唐宋,语文教材基本上是内容单纯、形式单一的韵文诗集式的集中识字读本。从《史籀篇》《急就篇》到《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等无不以识字为主。

自南朝《昭明文选》问世以来,我国除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韵文诗集式的集中识字读本外,又出现了一些散文故事类和文选类等文言选编式教材,如《二十四孝》《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等。

光绪中叶以后,随着变法维新浪潮的兴起,中国语文教材开始借鉴外国经验,注重体现对学科性质、教学目标的全面理解和整体



把握,逐渐出现了文言国语选编式语文教科书,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的《最新国文教科书》是这一时期的代表。

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教育界提出的“言文一致”“国语统一”的主张得到北洋政府的承认,于是,以国语型书面语言为重点的语文教科书相继问世。《新国语教科书》的出版发行,标志着我国中小学语文教材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中小学语文教材以单元组织选文日益发展,单元组合形式渐趋多样化。不仅有以文体、作家、时代、题材为内容的单元组合,更有读写结合与融语文知识、范文和作业于一体的综合单元。在综合单元中,前者以孙俚工编的《国文教科书》最为典型,后者以夏丏尊、叶绍钧编的《国文百八课》最具特色。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的现代语文选编式教材出现并逐渐成熟。中小学语文教材无论是范文的选择、单元的组合,还是结构的安排、练习的配置等已逐渐走向系统化和科学化。特别是2000年秋季根据新大纲精神编写的语文教材,使内容和形式更为科学,其突出特点是:①反映“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②重视语言积累;③重视创造和创新能力的培养;④重视情意因素的培养。

2001年和2003年义务教育《九年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相继颁布,语文教科书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人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语文教材不应该仅仅成为知识的载体,更重要的是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激发教师创造的激情。”^①以高中语文必修教材为例,就出现了多种类型:①综合型教材。人教版以语文与生活的联系为线索,按“人与自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三大板块组织单元。②专题性教材。苏教版以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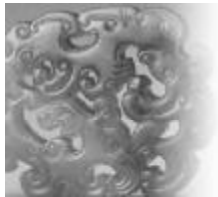
①: 郑国民:《课程改革视野中语文教材的发展》,《语文建设》2004年第1期。

话题为统领,构建研究性学习专题的语文教材模型。③活动型教材。鲁人版教材和广东版教材以活动学习为线索、中心和载体,以学生自主学习的视角来叙述、编制教材结构体系,以求让学生在活动中学习语文的教材模型。④语言鉴赏性教材。如语文版教材就是把语言能力培养与文学鉴赏相结合的语文教材模型。当然,语文教材还需要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以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五、中国语文教材发展的几条主线

(一)教材内容从单一的传统文

在我国古代,没有单独的语文学科,语文教育是与经学、史学、哲学、伦理学等教育融合在一起的。当时的教育是把德、才、学、识等都纳入蒙学教材及“四书”“五经”之中。从不同的视角看,我国古代的语文教材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种类,但蒙学教材、经学教材、文选教材作为古代语文的主体教材应是毋庸置疑的。这些教材从内容上看,都是以儒家为主的单一的传统文。清末民初的西学东渐之后,这种情况大为改观。特别是义务教育课程标准语文实验教科书彻底改变了原来将外国文学在语文教科书中作为点缀的现象,真正落实了《九年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提出的“理解和尊重多元文化”的教科书编写建议。以语文出版社出版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7—9 年级)为例,全套教科书的选文,注意充分反映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当代世界社会文化生活。6 册教科书中,中外名家作品占到现代文课文的 1/4,其中反映当代世界社会文化生活的作品超过了 70%。这些作品的作者分属美国、俄罗斯、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印度、巴西、黎巴嫩、澳大利亚、奥地利、波兰等 10 多个国家,改变了过去语文教材选取外国作品过于集中在某一个或少数几个国家以及内容集中在 19 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状况,尽可能地体现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这样选文有助于学生了解



和尊重多样文化,培养学生的全球化视野和吸纳人类有益文化的态度和意识^②。

(二)教材制度从古代的盲目无序向当代的制度管理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讲,教材制度变革的成效直接影响着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进程和效果。所谓教材制度,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其教育体系内所规定的有关编辑、审查和选定的制度。在科举时代,我国本无“教材”之名,更无教材审查制度。因此,我国古代的语文教材编写是盲目无序的。从1904年开始,我国才有教科书制度。在近现代,教科书制度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04—1911年),实行审定、国定并行,但以审定制为主;第二阶段(1912—1936年),仍以审定制为主,但时有国定制;第三阶段(1937—1949年),国定制与审定制同时并行,但以国定制为主。解放以来,我国长期实行大一统的语文教材编审制度,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有它一定的积极作用。进入新时期以后,语文教材编审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而且很快就迈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步伐。为了适应教材改革的需要,原国家教委于1986年9月成立了“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其工作职责主要有三项:一是审定各学科的教学大纲和教材;二是指导各学科教材审查委员会的工作,解决教学大纲和教材审查中提出的问题;三是指导教材的评优工作。这是我国教材编审制度的重大改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中小学教材编写就由过去的“编审合一”制变为“编审分开”制。即只要不违背《九年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的要求,只要通过教材审定委员会的审定,就容许各省市、各学校甚至个人,编辑出版不同内容、不同编排体例和各具特色的中小学教材,互相竞争,以便在优胜劣汰的原则下,推动语文教材



^② 王小强:《编新教科书,促进语文课程改革》,《语文教学通讯·初中刊》2004年7—8期第46页。

的不断更新和发展。这就是向“一纲多本”、“多纲多本”的教科书体制发展。

（三）教材结构从零散知识向专题组元方向发展

我国古代没有严格分科意义上的语文教育，所以，也就没有具备教科书意义的语文教材。专供儿童集中识字用的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掌故性、故事性很强的有《兔园册》《幼学琼林》《龙文鞭影》等，进行语言文字方面教育的有《字体蒙求》《文字蒙求》等，古文选本有《古文关键》《文章轨范》《古文观止》等，这些读物在我国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曾对当时的伦理思想教育、知识教育和语文教育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但这些读物都是一些零散知识，编排上欠缺科学性，没有教材结构体系，都还不是符合教育科学和教学规律的语文教科书。经过 100 年的语文教材建设，现在出版的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大多朝着专题组元方向发展。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九年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从一年级开始，都是以专题组织单元，以整合的方式组织教材内容。每册设 8 个专题，分为 8 组。每个专题内涵都比较丰富，贴近儿童生活，体现时代特点，既蕴涵教育价值与时代感，又突出学习语文的特点。如四年级上册的教材就是按自然奇观、观察与发现、中外童话、作家笔下的动物、我国的世界遗产、人间真情、成长的故事、科技成就等 8 个专题编组。鄂教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第 3 册的 8 个话题单元分别是：爱的奉献、爱国情怀、名人故事、奇妙的自然、成长的故事、观察的乐趣、爱护家园、奇特的想象；苏教版高中语文教科书以人文话题为统领，构建研究性学习专题的语文教材模型。

（四）教材服务对象从古代的少数精英朝当代的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方向发展



众所周知,古代能够接受教育的人大多是王侯将相及富贵人家的子弟,庶民百姓的子女是很少有人跨进学校大门的。因此,语文教材的服务对象极其有限。近代新式教育的发展,为普通老百姓子女接受正规教育提供了可能。据有关资料统计:1907年我国仅有小学校34383所,小学生921965人;中学校149所,中学生31682人。到1949年已发展到小学校346800所,小学生24391000人;中学校4045所,中学生1039000人。从1907年到1949年,小学校数量增长了约10倍,小学生数量增长了约25倍;中学校数量增长了约26倍,中学生数量增长了约32倍。由此可见,中国近现代的学校教育从王侯将相的宫殿走向了寻常百姓人家,学校不再是培养少数所谓的“精英”,而是培养明智的大众,从而极大地推动了义务教育、普及教育的进程。建国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义务教育普及率不断提高,截止到2003年底,全国小学儿童入学率已经达到98.6%,初中入学率基本达到92.7%,高中阶段入学率基本达到43.8%^①。由此可见,语文教科书为“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以及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素质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总之,回顾我国语文教材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我国语文教材体系是从传统的教材体系中孕育、演变而来的。如果每个中小学语文教师都能了解我国语文教材发展的历史,那么就有利于他们掌握现行语文教科书体系,探索新的教科书体系,最终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



① 朱永新:《中国教育蓝皮书·2004年》,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中 国 语 文 教 材 发 展 史

序：从昨天走向明天 1

绪 论 1

上 编 中国古代语文教材

第一章 概述 15

第一节 古代语文教材的类型 16

第二节 古代语文教材的特点 18

第三节 古代语文教材的教育功能 22

第四节 古代语文教材的启示 25

第二章 先秦时期的语文教材 28

第一节 远古至西周时期的语文教材 28

第二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语文教材 32

第三章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语文教材 41

第一节 秦汉时期的语文教材 42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语文教材 53